中国经济学 70 年回顾与展望

陈宗胜　戚聿东 等

编者按:本文内容是根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 90 周年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第四单元主题论坛“中国经济学 70 年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分别主持了两个时段的讨论。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回顾 70 年经济学发展,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教育研究,前 30 年围绕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的是计划经济;后 30 年就比较多元,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学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进程中,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分析方法等,反映在经济学研究上就是越来越技术化。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开放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学习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讲也有技术化倾向。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界有些反思,要重新回归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学界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括“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等等,都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从学术界的研究看,宣传性研究偏多,学理上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显然,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化、学理化是经济学界研究最重要的任务。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脱离贫困陷阱后会进入两个新阶段,一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的阶段,二是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的阶段。两个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特点。第一阶段由需求决定,稳定状态下,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可以替代的,提高通货膨胀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到了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没有了,经济增长就回归到自然增长阶段。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不复存在,这就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

应该说,现在政策发力的“三去一降一补”解决的是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不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的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和体制问题。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新常态、新阶段以后,经济学界确实面临着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以前经济学界是不承认的,现在才渐渐开始承认。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确实是非常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基本内容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它是一种新的体制改革,而国家创新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新常态,二是新的改革,三是新的开放。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大家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一是审稿制度,如果按照常规的审稿制度,基本所有的创新题材文章都被拒绝了,这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一样。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创新,现在的进步基本上都在理论上。二是审稿理念问题,对待一些重大的创新性理论问题,不要把它封死,新阶段需要有创新的思想和理论。

龙登高(清华大学):经济学创新路径主要有三条:首先是比较视野,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有很大

的差异;其次是从源头上来探讨,在历史演化和变迁过程中探讨创新;最后是依据原始资料的基础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从经济学创新角度看,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三个重大理论创新:一是土地产权制度,二是国家治理理论,三是公共经济学。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历史上许多经济现象,往往比现实简单,但土地是个例外。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历史上比当代更为活跃,研究也更为充分。同时,中国的土地产权比西欧历史上发育更为充分,土地制度史在中国70年有着深厚的积累。张五常在中国土地租佃基础上创新了制度经济学。近期基于中国经济史的土地产权理论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资源配置是以地权为中心、以市场为手段进行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就是土地的三种产权形态,私人产权、法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其二是土地权利是分层的,从而形成不同的产权形态,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占有权,对占有权继续进行制度挖掘可以去充实产权理论,占有权非常典型的表现是佃权。

第二,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宏观体系,另一个是基层秩序。欧洲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宏观体系的建立,但历史只有二三百年,中国的宏观体系建立了两千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深厚的制度遗产,在委托代理之下形成了庞大的长链条的宏观管理体系。维系大一统的国家,需要基层有一个相当于自治自发的秩序,从而使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去维系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在基层,有独立产权的民间组织,还有立体的全方位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有效的治理结构、公开透明的运作,构成了富有成效的制度安排。

第三,公共经济学。一般认为,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提供,而在西方是市场和公司去经营的。在中国历史上,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社会也可以做。比如,通过公益建造的渡口和桥梁,其特点就是民间组织去筹款、建造,建成后免费使用。而同时期,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则是由公司经营的收费桥梁、收费渡口、收费公路,获得利润后进一步驱动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的属性,不能随便做,需要政府对相关企业授予特殊经营权,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期,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其中,社会或者民间组织公益性的提供公共产品模式,在传统中国发育得很充分,但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最近经济学界花了很大力气,准备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库,为从历史到现实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经济史对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李绍荣(北京大学):经济学在中国经历过两个阶段,1949年之后,搞社会主义改造,搞计划经济时,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慢慢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借鉴西方经济学。实际上,中国经济学有两个体系:一个是自然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宏观,另一个是微观。大家默认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市场理论,是从市场行为这方面发展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个理论在经济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一个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争论。理论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只要把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市场机制完全改成跟市场一样理性的国家管理生产的部门,所有的产品还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可以达到西方经济学的最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也是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比西方还要好。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这一美国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堡垒,学生都不愿意学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学计划经济理论。芝加哥大学不得不重金聘请教计划经济的教授。这就意味着,西方这套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很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只适合解释发达国家经济,解释中国、菲律宾、非洲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可能无效。但如果西方经济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会在马歇尔之后转向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之后又转向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了。

实际上,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现实,现实中政府和市场是分不开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和市场是一个替代关系,好像市场做大了,政府就要缩小;政府做大,市场可能要缩小了。这个观点是错的,

政府和市场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市场规模扩大必然会扩大政府职能；相反，如果市场是缩小的，政府肯定也是缩小的。所有的市场经济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市场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管理，弥补市场的不足。在中国有很深厚的历史根基发展经济学理论，只有深入挖掘这些特点才能够出现解释现实的更好的市场理论。

黄先海（浙江大学）：中国经济学 70 年是中国经济学者学术报国的 70 年，以经济所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为中国经济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角色和职能确实非常特殊。目前，用西方经济学是很难来完全深刻解读的，需要从各个视角来进行分析。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产业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当中关键的争论主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但争论的焦点不应该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产业政策怎样实施的问题。从国际视角或者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产业政策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一概否定中国的产业政策。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选择赢家。美国产业政策的做法是首先竞争，胜者有奖励；中国则是在竞争前就给奖励。比如人工智能产业，2020 年国家要对十家企业给予支持。产业政策事实上是没法做到将赢家选择出来的，因此，选择赢家的做法失败的概率比较大。美国的做法是为赢家的诞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通过市场机制来竞选出赢家。对比两种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一个选择赢家还是孵化赢家的问题。中国产业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价格扭曲。WTO 也提出中国产业政策扭曲价格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房价远低于二线城市，主流经济学没法解释。原因是，一线城市房价是限定的，不允许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中国产业政策的第三个特点是强干预。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就指责中国的出口补贴严重违背了 WTO 的规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赢家、价格扭曲和强干预的政策补贴问题是需要克服、完善和改变的。

未来产业政策应该有中国特色，但又要符合国际规范的新的产业政策。根据中国提出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要符合三个原则：一是有国有企业，但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偏向于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二是有产业选择，无企业选择；三是有政府干预，无价格扭曲。这就需要对中国现行的产业政策进行重新梳理，甄别哪些政策要废除、哪些政策要修改、哪些政策要保住。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做法，比如没有价格扭曲的产业政策要大力加强；再有就是在策略手段上要进行改变，变事前补贴、事先激励为事后奖励；而宏观性、指导性的规划，在中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些是要保住的。在这样一个大的原则下，构建出一个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规范的新型产业政策，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张建华（华中科技大学）：讨论中国经济学 70 年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其中，经济调查的研究方法或者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一种长期的关注，对经济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 70 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前面有 30 多年的时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更多是让位于政治的需要或者其他目标的需要，对经济基础领域的研究忽略了或者重视不够，经济学研究收敛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1978 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调整，更多关注到经济发展本身，经济学研究也转向服务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变化导致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对目标定位重新认识、对一些基本问题重新认识，包括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权衡的问题等等。重新思考的结果，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这时候，经济学才会关注消费规律，才会注意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首先满足需求，研究吃穿住行，进一步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的问题，再考虑其他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当然伴随着对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重新去思考，如何与现代的先进理念、理论进行结合？

怎么去学习引进一些其他的经济理论?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08年以前。在2010年前后开始又重新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包括西方的理论范式也受到一些挑战,而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到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本身,但是又忽略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不得不重新进行反思。

回顾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想说明一下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实的关注,离不开对现实中最基本的一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今天来认识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重新去理顺一些关系和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中国经济70年发展,从吃穿住行消费的变化到生产结构的变化,然后挖掘技术在背后所起的作用,再从长期看就是创新的作用。从这些基本的问题着手去研究才能找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展望未来,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和使命应该是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关注现实,从基本的调查研究开始,然后扎扎实实地去和现实结合。比如,寻找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力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影响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大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应该叫斯大林经济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转型。早期,学斯大林经济学是正常的,因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而当时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就是苏联模式,所以要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相应的要学斯大林经济学,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奠定了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有点问题,因为这个经济学的特征是重概念轻结果。

实际上,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就被发现并不那么符合中国实际。所以,学术界开始进行了一些探索。比较典型的是由于光远等人牵头讨论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经济和改革三大问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的一个早期探索。这些早期的探索对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加强企业管理等。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政府派出了四个考察团,分别去了日本、西欧、美国、港澳、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其中,三个考察团与经济学转型有关;一个考察团和建设经济特区有关。去日本和西欧的两个考察团实际上考察到一点,就是在二战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而中国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需要转型。日本和德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所以,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发展经济。去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团,验证了社会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并初步学习了南斯拉夫的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到了思想解放。思想怎么解放?第一个就是学习日本、德国。从日本、德国请来政治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的国家经济顾问,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中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85年,当要进行扩大开放时,又请了新加坡的吴清瑞作为顾问。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很多概念并不是我国原创的,比如集权和分权模式,是布鲁斯提出的,价格改革和市场机制是奥塔西克提出的,等等。关于西方经济学传播,当时虽然也有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但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认知还很不足。邀请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讲学,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研修班,其一是颐和园研习班,其二是发展经济学的研习班,还有国内自己做的经济学讲座。比较典型的是发展经济学研习班,请来的不是纯学术意义上的专家,相当一部分在做经济顾问。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后来,经济学界进一步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政策分析和决策当中的作用。

今天,经济学界仍然应该从思想解放的角度出发,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广泛吸纳包含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成果在内的新发现、新成果。正如当时思想解放的时候所说的,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今天也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不只属于西方经济学,也可以用于分析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林木西(辽宁大学):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文科工作座谈会,呼吁要编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在教育部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共同主编北方本,北方本是由北方13所院校编写的;

还有一个是南方本，是由南方 16 所院校编写的；还有一个就是由 20 多个单位合编的北京本。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 1978 年的第一版到第十版，北方本一共经历了 35 个年头。从第四版开始，我参加了修订过程，有几点体会：

第一是超前性。北方本有一个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敢于突破。1978 年第一版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来相当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把物质利益作为研究主线，很明确地突破了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比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早了 14 年。经济理论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要有超前性。

第二是包容性。1981 年，宋则行先生在《人民日报》首先提出“关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概念，1984 年出版了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效益》，1988 年又写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2017 年是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重申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两者要相互包容、结合起来的主张。

第三是创新性。1988 年第四版最重要的特色是突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三个过程的提法，把企业和直接生产过程，政府和再生产的关系结合起来，到南开大学讨论的时候也得到认同。

第四是相对独立性。科学研究、经济学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不跟风、不盲从，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除了第四版的体系结构，谷书堂教授 1988 年提出“按贡献分配”的观点，到 1992 年获得了一等奖，1997 年写进十五大报告，中间经历了九年。

第五是在重视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同时，要重视队伍建设，尤其要鼓励年轻学者脱颖而出。中国的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要重视对年轻同志的选拔和培养，将来的研究队伍才能后继有人。

如何把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继承下来？一是要坚持时代性，与时俱进；二是要坚持特色化；三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是要坚持创新。

周文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经济学界应该有一些反思。这有一个《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编的小本子，是 1981 年 6 月出版的。这个小本子写的是 1949 年到 1980 年经济学问题的争论。现在，学术界缺少争论，缺乏一种追求规律、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不是不知、不懂，而是不敢说，或者说不敢用一种争论的口吻来说，这个事情应该引起学界重视。学界需要追求规律、逼近真理的学术态度。参观经济所的展览，我个人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老师们取得的这些成果，而是一些有争议的东西，特别是当时有争议的东西，比如像孙冶方先生，他的一个想法，反反复复思考，至少有几十次打腹稿；针对“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一现象，大家也是反复探讨、争论。现在，经济学界还是要有一种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敢于争论的学术勇气的。

曹廷求（山东大学）：现在高校的学科建设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符合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要求，二是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围绕这两个方面山东大学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个就是经济学部跟医学部搞了一个新的方向——类脑经济学，大家知道原来有神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这次在脑科学和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个交叉；第二个就是经济学跟哲学、政治学搞了一个实验班；第三个是科技和金融做一个交叉。在此基础上，原来的六个经济学专业，按照学校的要求缩编成四个。在学术导向上，引导老师去做调查，提出“服务山东”；在学术方法上，除了计量以外，多搞一些其他研究方法。

陈宗胜（南开大学）：龚刚教授谈的用学术理论来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结合现实为这些思想寻找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叫总统经济学。为领导人的思想说法和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是当代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 70 年，前 30 年接受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中国的现实是从 1950－1957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到共产主义,把斯大林那个本子越来越往极端化推进。走到极端后又开始转化,1978年以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学界又开始崇拜西方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崇拜斯大林经济学这是一种新理论。芝加哥大学把兰格聘过去讲计划经济也是一样的。到1978年之后,大家发现斯大林经济学有问题,需要改进。现在看起来,回顾70年的经济学发展需要将这两段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纯计划指令性的不行,但计划里面含着的产业政策还是需要的。现实中,政府在把工作落实下去的过程中,一定有些跟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产业政策,要产业不要企业,肯定落不实。怎么落实呢?就得树典型。黄先海教授提到的事后奖励,不是提前,这的确需要深入研究。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主体部分、主要部分。学科的萌芽是在总结新中国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学者的研究和回顾,慢慢发展起来的。197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科学院的经济室下面设了一个新中国经济史组。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这个学科算是基本形成了。在全国有三个研究团队,经济所一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个,还有一个在当代中国研究所。

这个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各个学科的方法、理论都在用,总的来看,它的研究范式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历史学者出身的,还是偏重于史学方法来做研究;有经济学素养的,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另外,厦门大学还有一个做社会史的传统,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除了这三个范式之外,还有党史的范式和国史的范式。总的来看,有几个大的范式中间有一些摩擦或者不同,比如,经济学和历史学范式看问题就有不同的地方。青年学者比较喜欢用两个范式来做,一个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计量经济学方法。新一代学者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特别喜欢用计量史来做经济史研究。

总的来看,现代经济史这个学科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基础资料支撑,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史学科必须重视起来,用一些经济史的案例来为这个理论创新提供素材。

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虽然,经济史从理论上,学科归属于发展经济理论学,这门学科从诞生到现在从主体部分来讲,更接近历史学的一个学科。经济史研究也有很多对理论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史学70年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历史观的变化。跟经济学总体变化趋势是一样的,在1949年之后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有很多不完全相符的地方,怎么解决现实和理论的冲突,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和经济史相关的,主要是有三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萌芽,中国是不是也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在中国的社会表现是什么?二是关于土地关系的研究,也跟经济史密切相关。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可能比较过时,但是对历史研究的推进还是有比较大的贡献。三是1949年之后经济史的核心问题转变讨论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哪些因素对现代化有帮助,哪些有阻碍。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前几年,都是用这样一个主导的理论范式来做的研究。

近几年现代化的范式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史或者整个历史学在呼唤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会和以前不一样。比如,现在兴起的全球史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冲突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历史观的一次革新?这个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历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与经济学可能有类似之处。

第二是新的方法。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史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科学化的过程,更多去掉人文的色彩。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过程更加明显。经济史

学界借鉴和应用了更多的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史，除了经济学之外，也用一些历史地理空间的方法做经济史，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也用的比较多。一般认为，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还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没有做到或者很少做到通过归纳和抽象历史现象，对经济理论有所创新。现代经济学用的主要是计量方法，但经济学和历史学由于基本的方法观、基本的问题意识的不同，在这个学科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有好处，好处就是它会激发每个学科各自反思自己的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它也有坏处，坏处就是大家可能隔阂会更深；而且计量的方法几乎成了经济学唯一的方法，对经济学其他的理论在经济史当中的研究，比如产权理论、地权理论的应用，可能会有一定的阻碍。

第三是新的历史资料。从 1949 年开始，特别是 1990 年之后，新资料的规模数量是非常巨大、非常惊人的。从先秦的竹简文书，尤其明清以来的档案文献逐渐公开，这些文献挖掘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新的文书资料的深度挖掘，可以说改写了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认识。虽然现在历史学家呈现出来的成果都是部分的、碎片化的、阶段性的，但是如果尝试把它做一个总结，得出的结论和以前所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的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挖掘出来这么多的资料，我们用数据库来整理和处理这些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我们研究有很大的促进。

宋敏（武汉大学）：1985 年，社科院接了国家计委的课题，研究中国经济如何翻两番，实现小康。什么叫翻两番？到底反映在哪些方面，需要一个量化的东西。当时还是在学计划经济苏联的投入产出表，用的框架有投入产出分析，也有生产函数，也有需求弹性。很多东西是用计算器算出来的，这个研究应该在决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早期的研究，数据很少，方法也比较简单，工具几乎没有，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第一阶段的研究状况。

用西方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是有解释力的。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用数据去做实证研究以后，发现规律的显著性比用西方国家的数据还要显著。这个规律是非常清晰的。比较一下中西方的研究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特殊性和一般性。中国的学者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特殊性的问题，更多是关注中国的问题。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大部分还是讲的中国的问题，这个没有错。但是缺乏把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这样一个考虑。国内的学者更多是在研究分析中国的问题，可能给出一些解释。但以后的 70 年，肯定是从中国问题到世界问题，中国将来肯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问题本身就是世界的问题，不能光从中国来看中国，更要从世界来看中国，同时从中国看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从世界看世界。现在大部分看的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包括一些贸易争端等等。从国家利益、从民族利益，这些角度都没错，更高的视角要跨越这个东西，站在更高的全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了，学者对它的内涵，对它的规律还没有提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个理念上是先于很多学者的，但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不是纯粹从中国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人类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要从中国的特殊性到一般性，最后从一般到一般。今天听到很多讲话说要为国家服务、解决国家问题，这个都没错，但是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纯粹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

第二，学术性和思想性。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有点过于讲究学术性，而缺乏思想性。所谓学术性，讲逻辑，很严谨，也很细致。但是这些研究遗漏了很多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有这个倾向，也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很细的分析。但是没有抓到根本问题，学术没有思想不行，思想没有很严谨的分析也不行。怎样做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是对学者很大的挑战。

第三，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过于注重工具，更多强调逻辑分析，强调回归，好像没有数据、没有回归就做不了文章了。强调数理，但是缺乏社会调查。数理分析和社会调查是不能偏颇的，数理更多

是讲一般性,社会调查讲特殊性,这两个是都需要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重视分析,但是往往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关注工具,却忘记了问题。我们的学者们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

中国的经济学以后应该怎么做?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西方经济学家也在反思。但怎么去超越西方经济学,或者怎么样去引领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第一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各级政府是起了很特别的作用。我们需要有为政府,又需要政府有时候有不为,有时候又需要有限政府。市场也是这样的,要有效市场。另外,应该还有社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要相互协调要有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和有情的社会。

第二是高质量发展。现在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什么叫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就是发展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但什么叫创新发展?怎么样有更好的创新发展?政府起什么作用?什么样的创新政府该起作用?什么样的创新让市场去做?这些还没有讲清楚。共性的创新,外溢性的创新是需要政府投入的,包括绿色发展,这都值得中国经济学家真正花时间去做的。

第三是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现实比理论研究走得快很多,学术研究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还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但现实已经到信息时代,到AI时代的经济学,大量的数据,这些东西对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冲击。在这方面,中国有希望,中国网络经济在全球已经不落后,而且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撑经济学创新研究。

第四是大国经济。很多西方经济理论还是小国经济,包括贸易,包括增长。所谓大国经济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超出了自身,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大国经济一定是战略的角度,一定是从政治的角度,现在中美贸易摩擦,西方没有这个理论,两个国家发生战略冲突以后,贸易应该怎么做,FDI应该怎么做,根本没这个理论。

张维(天津大学):从历史回顾,研究什么东西,跟时代的关切是相关的。这个东西也可能是经济规律需求的本身,也可以是超越经济需求规律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在不正常的年代研究所谓的经济学,可能关注的不光是经济学本身,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但要展望未来的话,就需要来回应现在的世界需要什么。现实也有很多新的需求。比如,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刚才讲大国经济这样一种概念,以前是没有的。另外,技术的发展,使经济形态出现了很多变化。其中,某些经济规律也跟以前有所不同了,需要创新经济学理论来回应重大的现实。要像经济所老一代学者一样扎根实际、尊重事实、感知社会、胸怀天下。

随着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变化很大。对科学知识的贡献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像英美那样的国家作为一个主导。另外,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发展确实给经济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变化,不仅带来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带来了研究手段和研究素材的变化。还有就是要跳出现有的一些框架,破除已有的一些假设。最后是研究方法需要多元性。当研究的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考。胡适说过,“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梁琦(中山大学):集聚是空间经济学的主线,但是在20年前,甚至是在15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是没有空间经济学的。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大量用到一个词“集聚”。但集聚这个词以前是没有的,在新世纪交替的时代,中国经济学人创造了这么一个词。

任何理论阐述和发展,都离不开时间土壤,产业集聚理论和空间经济学十几年的发展较好地完成了三方面阶段性使命:第一是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东西部差距和今天的南北差距,都是源自东南沿海的产业集聚、进出口贸易集聚和优质劳动力的集聚,集聚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和工业的崛起。第二是成就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加速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首先是人的集聚。第三是促进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加速了中国经济全球化。

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集聚到虚拟集聚。与迅猛发展的“大智云移”为代表的新技术革

命相结合，空间经济学应该从地理空间往虚拟空间拓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是未来的方向。中国的经济未来一定是有更加广阔的、更加真实确切开放的全球空间。

陈乐一(湖南大学)：1952 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来又出版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很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当时经济学发展的主导范式。1956 年提出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观点；1957 年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合作的矛盾统一体，价值规律是通过经济核算调节社会生产的，顾准是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1959 年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还进行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和经济核算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出现了繁荣，经济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 1979 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还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突破苏联范式的束缚，但很快迎来了我国经济思想的繁荣。1984 年莫干山会议，到现在影响都是很深远的，同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后，经济学得到了长足发展。1992 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计量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发展成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起决定作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十四届、十六届、十八届，这五个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经济建设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也存在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我国是经济大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也成了大国。经济史发展很快，但经济理论还是滞后于实践，尽管发表的论文、书很多，但是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还是没有跟上，而且原创性不足。

总的来讲，学术质量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够高。经济学下一步怎么发展？要创新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学发展质量，推进经济学的范式变革，不断完善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要把握四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西方经济学的资源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资源。经济学方法，应该注重回应现实，学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重视数据运用的同时，也强调思想。不仅要学会做实证分析、数理模型的分析，同时也要重视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的研究。

杨万东(中国人民大学)：1978 年以前的 30 年是中国的建设期，和建设期相配套的思想建构基本是以苏联的模式加一点点中国特色。基本的理论核心就是用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的模式。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转型，引入了市场机制，而且不断增加市场机制的力量。在经济学研究中就是不断引入了西方的研究范式。这个时期是赶超期，既包括经济的赶超，也包括经济学学习和赶超。这个时间完成于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范式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了。这种范式下，经济学出现了同构化、同质化，用一个很复杂的论证来讨论一个不需要论证的问题。这是目前经济学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此期刊界自己也有反思，也做了很多讨论。从 2018 年开始，经济学期刊里面开始讨论经济学方法的文章多了起来。2018 年，《企业家的箴言》这本书对整个经济学所有的分支学科一个一个的点名批判。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艰难，很多问题都需要经济学理论去回答。这是经济学界的使命。

(编辑整理：谭 易)

(校对：孙志超)